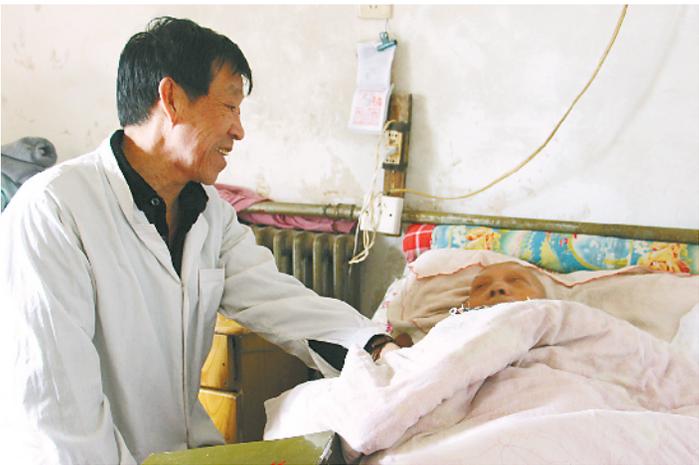


从1970年到现在，45年来，杨国山秉承“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精神”，妙峰山的路他不知走了多少趟，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医路。



## 杨国山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 45年就走妙峰山这条医路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文/摄

赤脚医生，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一个陌生的名称，而对于四五十岁的人来说是一个记忆。那么现在的赤脚医生在做什么呢？3月8日，记者在门头沟区妙峰山镇丁家滩村卫生室采访了曾经的赤脚医生现在变为乡村医生的杨国山。从1970年到现在，45年来，杨国山秉承着“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赤脚医生精神”，不知走了多少乡村小路和山路，不知走进多少次乡亲的家门，不知救治过多少乡亲的疾病，不知从死神手里抢回多少乡亲的生命。如今，已到退休年龄的他仍然不愿退出卫生室，他是不舍救死扶伤的乡情。

### 根红苗正被选当上赤脚医生

这天早晨8点30分，记者如约找到了丁家滩村卫生室。丁家滩村是一个背靠大山的山村。村民有1000多名，方圆几公里。记者走进简陋的卫生室，只见杨大夫正在给一位村民量血压。桌上放着处方纸，一个难得一见的19档算盘，火炉子在燃烧着。赤脚医生这一名称是1968年9月开始在全国出现的。它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赤脚医生一般是未经过正式医疗训练和教育、仍持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从1985年起，赤脚医生改为乡村医生。

“你看过电影《红雨》和《春苗》吗？”杨大夫问记者。“看过。”记者回答。“我的情况与红雨和春苗差不多。我是1970年，18岁时被大队推选为赤脚医生的。那时，当赤脚医生的人必须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杨大夫讲述了学习医疗知识的情况。杨国山与村里其他几名村民到区里的医院、附近的部队医院学习医疗知识，

怎样打针、配药，断断续续地学习了一年多。杨国山说：“对我们赤脚医生来说，还有‘四自’，就是自己种药、自己采药、自己制药、自己用药。我们还经常到深山里采药。”

### 24小时的全职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按现在时髦的叫法应该是草根医生。杨国山家就住在丁家滩村。他知道远离城里的乡亲们看病有多么的困难。因此，只要乡亲们什么时候需要看病，他都会及时地出现在乡亲们面前。杨国山说：“以前是，现在还是24小时的全职赤脚医生。”给杨国山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在1974年的一个冬天。

这天深夜下着大雪，一位村民把正在睡梦中的杨国山叫醒，是一位女村民突然患病，疼痛难忍。杨国山穿上大衣，背着小药箱，冒着大雪，走在崎岖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赶往这位女村民家中。杨国山诊断了女村民的病后，认为是胃病，自己的医疗手段不能治这种病，只能送区里的医院。他给病人打了止疼针后，推着小车，走了几十里，把女村民送到了区医院。他又帮助找熟悉的医生给女村民看病。医生说：“多亏你送的及时，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了。”杨国山整整陪了女村民看病一天一夜，回到卫生室仍然继续工作。

杨国山说：“现在，临时出诊的事情也有，更多的出诊是到年龄大的，走动不方便的老人家。”

### 治疗疑难杂症的赤脚医生

在卫生室的半天时间，时常有村民到这里看病、开药，也就时常打断记者的采访。记者看到，杨国山看的

病情种类很多，甚至还给狗看病。杨国山说：“我一般看常见病和多发病，疑难杂症看的比较少。”“疑难杂症本身就少，能够看疑难杂症说明医疗水平够高的了。你看过疑难杂症吗？”记者说。杨国山说：“看过。有一位乡亲腿疼走路不方便。他到处寻医问诊，也没有效果。有的医院诊断是坐骨神经痛，有的医院诊断是风湿病。他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也不见好转。他带着试试看的想法到我这里看病。我看了看他的舌苔，告诉他，你可能是脑梗。我给他开了药，并且告诉怎么治。只有几天的时间，他的病有明显的好转。有些病不能按常规的方法去看，疑难杂症就要用疑难杂症的手段治疗。”

一位看病的村民对记者说：“杨大夫可以说是全能医生，中西医都懂，甚至骨科也懂。没有这能耐怎么给我们看病。我们看病先过杨大夫这一关，然后，再到大医院去看病开药。”说到这里，杨国山告诉记者：“转为乡村医生之后，我们的职责又增加了，有普查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等任务。2003年闹非典时，我们严格检查进村人员。我们村有一名发烧的村民到我这里看病。给他送到医院时，认为他是疑似非典，把他隔离了，也把我给隔离了半天。结果是虚惊一场。”

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没固定薪金而是挣工分。成为乡村医生后，同样是待遇很低。45年来，杨国山有过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有当工人的机遇，但他割舍不断乡情。大队领导说：“你走了，乡亲们得病后谁来管。”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杨国山仍然坚守着45年来没有离开的卫生室。杨国山重复着：“我退休后，乡亲们得病后谁来管。现在是后继无人呀！”

本版支持  
北京职工  
婚姻家庭建设协会

### 岁月留痕

## 我在北京站得到工作又得到爱情

□马淑珍 供图 阎义 整理

1958年，我在天津火车站电务段当电报员。1959年，新北京站建成之后，需要根红苗正的职工。我被挑选有幸成了新北京站第一代职工。来到新北京站后，我便分配到贵宾候车室，负责接待贵宾。从1959年到1983年，我在这里工作了24年。在这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接待过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接待过朝鲜等国家的领导人。同时，我也得到了爱情，认识了我的丈夫郭子丰，过上了幸福生活。



这是新北京站建成不久，我们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合影。经撮合，坐在我（前排右一）旁边的小伙子（前排右二），成了我爱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北京站成为“国门”。繁忙工作之余，同事们在贵宾候车室合影留念。前排左一就是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东京火车站来到北京站访问。他们临走前给我照了张照片。



2014年，退休多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站贵宾候车室。我给她们讲述过去发生在贵宾候车室的故事。